



扫二维码 看大学视界

人才流动呈现出一种循环的状态,首先是人才流失,然后是人才引进。中国有大量侨民的人才池、资源池,这就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预示着中国在未来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 高教创新凸显国际化视野

■本报记者 韩琛

如今,高教国际化绝不是什么新鲜词,高校的国际化水平早已成为各类大学排行榜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包括信息技术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对大学,对教育的方式,也在产生重大的冲击。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远赴海外留学,国内大学也吸引

着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来到中国,中外大学将实现合作办学。

日前,三十多位海内外的高等教育界人士汇集苏州,在2016高等教育创新年会“第三届高教国际化论坛”上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对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顺应和利用国际化潮流进行思考。

## 观察 中国大学的3.0时代

“建设一流大学的运动、大学扩招与大学国际化同时进行,这是中国大学3.0时代的显著特点。”

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香港教育研究学会会长李军介绍了他的对中国大学的时代划分理论。

在他看来,中国大学在清末以前可被视为1.0时代,在那时,政府出资办学,“钱都是从政府来的,管理是政府的行为”。他表示,授课为儒家经典,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的传统”。到了清末,大学开始改制,走向现代化,是为2.0时代。此时的大学是为政府服务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属性为中西学堂,就是政府出于学习西方的目的而设。而1998年之后,中国大学进入3.0时代。

“我觉得中国大学现在取得的成就,真的不得了。没有一个国家在三大运动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大学还能够增长。”李军说。比如,在十年时间内,中国大学招生录取率实现了大幅度跨越,这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生过的。

李军把现在大学大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美大学的模式,大学是从教堂里分离出来的,跟政府机构的关系保持独立,是疏远的关系。第二类大学事实上是政府的机构,与政府融为一体,不仅包括中国的大学,也包括法国、德国甚至

罗马模式的大学。

关于中国大学3.0的特点,李军还提出了人文主义的使命。在他看来,这一使命从中国学问的传统而来,是知行合一的使能。“我们讲大学创新的目的是在哪里?我们创新是为了什么目的?科学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我们问的是科学的目的是在哪里?大学的目的是在哪里?这个地方我引用了王阳明的一句话,‘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他说。

李军提到,中国大学有和而不同的特点。他以西安外事学院校园中的雕塑以及西交利物浦大学主楼门前的雕塑等不同大学的实景图片举例。其中,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人,也有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从校园风格而言,中国大学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建筑及文化特色。

对此,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西民补充道:“雕塑表达的是中外圣贤的对话,这是西交利物浦最核心的理念。”

他透露,不久后,人们将会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南校区看到一尊新的雕塑,依然传承这样一个理念,寓意是一群来自世界的人在苏州创造未来,创造新的历史。“所以,雕塑人物中有不同肤色的人,有学生,有老师,有行政人员,也有管理人员。”席西民说。

## 建言 海归、华侨会成为创新源泉

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中,人才始终是任何大学都非常重视也热衷吸引的重要资源。悉尼大学教授、天津大学兼职教授安东尼·韦尔奇敏锐地注意到并且指出,海归和华侨是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源泉。

“现在,人才流动呈现出一种循环的状态,首先是人才流失,然后是人才引进。”韦尔奇说。他根据已有的研究图表指出,中国对于人才引进越来越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员回国。

韦尔奇表示,他研究发现,在国际移民中,特别是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这些移民,都呈现了高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这些人的技能和创新能力都较高。“另外,有一些证据也显示,海外非常高层的人员,他们不太愿意回国,虽然这个形势目前在有所转变,但是现在还是有更多高层次人才不愿意回来。”他补充道。

韦尔奇以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的具体情况作对比,他提到,以色列的人才引进计划没有中国

做得那么好,“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优势,虽然两国都非常重视学习和教育——这是两国文化的核心,但是中国的体量以及拥有大量侨民的资源池,都是中国的主要优势”。

“创新是没有局限性的。”韦尔奇强调道。比如,没有边界且即时的网络,可以帮助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协作。

而在吸引海归和侨民方面,他肯定了中国的吸引力。首先,中国政府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在科研及教育领域大力投入,“大家也看到了研发的增长,其实在最近几年都能够达到19%的增长,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其次,中国在科研成果和出版物的发表方面也在不断地增加。

就韦尔奇的观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们其实非常关注中国,“他们也非常的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中国有大量侨民的人才池、资源池,这就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预示着中国在未来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他说。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 路径 政府、大学与产业的协同合作

在韦尔奇的比较中,政府政策是人才引进的主要助推力之一,而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谈到西交利物浦这十年的发展时,席西民表示,地方政府主动上门的服务让他印象深刻,大学因而得以在有效而良好的环境中成长。

对此,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杨知评介绍说:“我们现在制定了亲商的服务理念,就是对客商友好,我们有一站式服务体系,包括海关监管、企业服务等等,这些都为高效、务实的服务体系形成了制度安排。”

苏州工业园区多所国内外知名大学设立分校的成果可以被看作大学与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合作成果,而在宏观层面,也有大学敏锐地注意到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对于推动高教国际化乃至辐射更大范围的发展的作用,比如“一带一路”战略为西安交通大学带来的发展机遇。

“目前这一建设得到教育部和陕西政府的支持,因此在很多政策方面我们会得到非常有效的支持和保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光介绍了未来西安交通大学关于创新的思考,那就是创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这一新区将按照国际化的模式和要求建设。

据席光介绍,西安交大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发起至今有130所大学愿意

加入联盟,该联盟提供了大学间的合作平台,包括学生交流、双学位项目、共建实验室等内容。至于在与企业的合作方面,席光把西安交大、韩国某大学以及韩国知名企业LG三方共建产学研合作实验室作为例子。“我们要选择在最需要的、国际最先进、最有影响力的领域建造创新港。”

“除了沿丝绸之路地理空间分布的近百所大学外,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校长也参加了我们的联盟大会,对此也非常支持。国际化的理念就是多元文化的互建、包容,要用新的思路重塑国际合作的理念。”席光补充道。

他还提到,科学研究形式的重组是这次新建创业园区重要的基础,西交大现有100多个研究所,实验室将按照交叉学科、前沿学科的要求,划分成23个研究院,另外要建立重大的基础设施,包括列入国家规划的国家实验室等等。与此同时,席光表示,这种重组对人才培养的模式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四的本科生将全部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创新港同时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础条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区,它是我们思考未来西安交通大学如何提升水准,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设备服务等多方面,是新的综合举措,这个新区是未来我们理想中新的大学运行的模式。”席光说。

作出反映,并积极配合处理。裁定一篇论文是否抄袭,须经过高校学术委员会或委托校外第三方机构核准,最后将结果以公开的渠道告知公众。尽管论文审核的难度有高下之分,但是一拖大半年,确实看不出该校对待学术诚信应有的态度,如再无视媒体的监督,恐怕又要步“不了了之”的后尘了。

## 73所部属高校: 预算最大相差179亿元

据媒体报道,截至5月12日,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至少有73所高校公布了2016年度部门预算。收支总预算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年度预算均超百亿元。第一名与最后一名预算数相差约179亿元。

这样一份数据出炉,难免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者出来说事儿,但是,“不同高校的产出贡献不同”,承认高校贫富差距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之所以让读者觉得忿忿不平,大概是因为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相差太大,且高校自身的预算信息也不够透明。

业界人士认为,越是知名的高校募集资金的能力越强,因此,应不断完善高校募集社会资金的法律、制度,鼓励它们合法募资;同时,逐渐淡化高校财政支持,推动教育资源投入的均等化。这么说不无道理,长期依靠政策扶持导致一些高校“不差钱”,但是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对社会的回报却在“温水”中萎缩。

而要取得公众的理解,还要很好地回答另一个问题——钱都花哪儿去了。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频发,给人一种高校是腐败重镇的感觉,如何及时公开地预算支出,如何回答好社会回报等问题,真正做到接受社会的监督,这大概才是让公众停止争议的定心丸。(温才妃)

## 『论文至上』与『改革空转』

■尤小立

最近,又见有媒体在议论“论文至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极易辨别,或可称正,误一目了然,无须再这样耗费笔墨,但有些看起来容易解决的事情,诉诸于实际,却往往不容易解决。

不容易解决,不是因为有关部门没有动作,而是因为这些动作往往以其他替代的方式实施,结果成了变相消解问题的“假动作”。这个“假动作”一般又以“改革”的名义出现,因而就形成了类似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改革空转”。

造成“论文至上”局面的原因,今天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行业等级的意识,二是“大而全”的思维。

行业等级意识是天然地承认行业之间有高贵与卑贱之分,因而不顾现代社会分工的合理性,硬把不同行业的标准统一成一个标准。以“教授”职称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到90年代中小学教师里评“教授”,再到新世纪以来大量的行政官员、公司高管在大学充任“兼职教授”“特聘教授”,这种泛滥局面的产生,就是因为许多人眼里,“教授”仍是一个内心向往的至高荣誉,因而被制度化地确认和放大,成为社会的时尚。

问题在于,都成“教授”或都想成“教授”就必然要撰写论文、论著。大学教授在教学以外,不从事研究,不将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与同行交流,供同行参考,还能干什么?不在大学中全职工作的人员一旦成了“教授”,自然也有义务和责任从事研究,进而撰写和发表论文。我们在学术期刊上经常看到具有领导头衔者发表的长篇文章,再联想到他们日理万机,整日地开会,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不由得感叹他们充沛的精力。他们应该也是在尽“教授”的义务。

这部分大学的“编外人员”当然不如大学内的从业者多,发表的论文也不可能多于大学内的从业者,但日积月累,数量仍不算小。

应该说,“大而全”的思维与行业等级意识并无本质的差异,它也是由忽视正常的社会分工而引发的。“大而全”看上去是求“大”或求“全”,但实际上,“大”和“全”都只体现于外在的规模上,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多重价值和多向追求,或者说不能真正体现“行行出状元”。

有此“大而全”的思维就不难理解“全民写论文”局面的产生,以及发表论文对学生、教师和学生以及几乎所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从逻辑上说,要解决“全民写论文”以及“论文至上”的问题,自然是要从改变思维和意识入手,并且将新的思维和新的意识转化成机制,以便落实。

不过,近来批评“论文至上”者,却仿佛未从此考虑。不仅是媒体,一些教育工作者也现身说法,以大学是教育机构的名称,将论文贬得一文不值。甚至面对一些学术期刊出现关系稿和买版面的现象,经常发表论文者与总不发表论文者相比,后者反倒成了守身如玉的诚实正直之士。这种由“论文至上”到“论文至下”的矫枉过正倾向明显在加快“改革空转”的速度。

其实,论文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我们看待论文的方式。以当今大学最普遍采取的方式来看,如果仅以期刊的级别论英雄,等于把杂志当成权威;如果以数量为标准,就等于看人看人,可以当裁判。这两种情况,严格说来,都是外在的衡量,仍然属于外行考核、外行评判内行的行政化行为。

外行考核和评判自然无法确定论文内在的质量,即使是由行政部门外送进行同行评议,最后掌握决定权的仍然是外行。因此,在目前职称评定中,多数晋升者也只能连呼幸运而已。

一方面是滥用一刀切,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另一方面是设置多道门槛,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虽然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经历过职称评定、奖项申请者都不难体会到论文的软弱,因为论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它不过是最低标准的要求,表格上还有课题经费、获奖、学位、海外经历等等本来可以被论文所代表的项目,它们借助“综合考察、全面衡量”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考验申报者的承受力。

论文(论著)在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那里之所以应该具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对人文社科、社会科学以及理工基础学科的学者来说,其学术研究主要是通过论文(论著)的形式出现,其学术水准也体现于论文(论著)之中。只要秉持质量为本的原则,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执行,以论文作为衡量标准,比节外生枝式的所谓“综合考察、全面衡量”要公平、公正和简单合理得多,被吐槽的几率肯定也会小得多。

如若取径于此,也不至于让改革继续空转下去。

## 壹月教评

### 114年校庆 114对新人集体婚礼

2016年是校庆大年。其中,不乏有五大交通大学全球共庆120周年校庆、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公告全篇文言文这样的新闻,而南京大学114周年的校庆,走的则是罗曼蒂克路线。

我们常在毕业季看到高校集体婚礼,寓意“毕业之后不分手”。那么,校庆举办114对新人集体婚礼,又有什么深意呢?原来南大校庆当日正好恰逢5月20日,“520”谐音“我爱你”。在114周年校庆114对新人喜结连理,别有一份浪漫的5月情怀。

不妨来回顾一下,多年来我国高校校庆活动的演变。



南京大学校庆上的新人 图片来源:新华网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高校校庆越办越火,不仅办校庆的频率高了,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一掷千金举办豪华校庆,校友们比赛掏腰包捐钱盖楼,包下人民大会堂举办校庆晚会……

曾经一度,北京创办了一份《中国校庆报》,对于校庆的广告大肆宣传,无形中使校庆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归到温馨、从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下发了“八项规定”,而校庆从简反过来又提醒我们思考举办校庆的初衷。

就像一个人为什么热衷过生日,大致上有几个原因:摆阔也许只是手段,他更希望借此联络朋友的感情,提升个人魅力,并得到祝福与礼物。那么,我们能否以过生日的心态,完成一次校友之间的聚会?

它可能就是一场合体婚礼,一篇文言文,但带给人心灵的涤荡却是深远的。

### 江苏6所“211工程”高校: 不减本省招生数

5月16日,江苏省教育厅就2016年高考“减招”问题召开发布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江苏的“211工程”高校负责人出席了发布会,明确承诺今年高招不减本省招生数。

事情源自于,今年的“跨省生源计划”中,共有10个省份生源计划调出16万,其中,湖北和江苏两省的生源计划调出总数最多,分别为4万人和3.8万人,这引起了当地一些考生及家长“是否影响高考录取率”的担忧,并到两省教育厅门前抗议。

教育上向中西部倾斜,惠及更多农村、不发达地区生源,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扶贫”却要分割优质资源省份的“蛋糕”为代价,且江苏、湖北与北京、上海分割不均,这难免引起公众的质疑与不满。尽管江苏省教育厅承诺今年高招不

减少本省招生数,但是长远之道该如何更值得人们深思。

有专家建议,做增量改革,在不损害既有利益的情况下,寻求最优改善。同时,政府部门要及时公开具体涉及的批次和院校,以及调整高考的录取情况,以免引发恐慌。也有专家认为,长久之计在于打破现在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全国统一高考+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实现更高层次的高考公平。

总而言之,在现行框架下通过调整高考招生指标数难免产生矛盾,设计一套科学的解决办法才是上策。

### 教授论文被曝抄袭

#### 7个月后仍没结论

“第一,从不回避。第二,没有回避的必要。正在按程序进行之中。”

5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建中就该校教授孙选中论文涉嫌抄袭调查进展向媒体回应。

2015年,媒体曝光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孙选中被举报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该校于去年10月启动调查,但7个月过去,仍未得出有关结论。

论文抄袭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并不是每次论文抄袭事件都会受到媒体的追踪关注,这也使得部分论文抄袭事件,在一片沉默声中不了了之,缺少给被抄袭者、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

今年4月12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对高校应受理的论文抄袭情况予以了界定,不过未明确规定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调查期限。

可以说,这是程序设计上的一个漏洞。正常情况下,论文抄袭不是一件小事,高校应在短时间内